

目 录

1 导论	1
2 实际考虑	21
3 分析的准备	48
4 质性资料分析策略	71
5 介绍情境、过程及理论整合	96
6 备忘录和图表	127
7 理论抽样	153
8 形成概念	169
9 阐明分析过程	206
10 分析情境	242
11 将过程纳入分析	259
12 整合类属	275
13 论文、专著的写作及研究成果的报告	288
14 评估的标准	310
15 学生的的问题及回答	328
 附录 A 第 4 章和第 6 章的练习	 345
附录 B 越战老兵的研究	349
参与者#1	349
参与者#2	364
参与者#3	370
参考文献	375
译后记	387

如果艺术家在其创造过程中不对新的愿景进行完善,那么他只是在机械地行动,就像头脑中有一个蓝图,在重复某种固有的陈旧模式。

——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1934, p. 50

像怀疑、信仰、思想、观念等这样的词语,如果它们所特指的东西有任何客观意义,更不用说获得公开确认,那么它必须被放置在并描述为行为,有机体和环境在其中共同行动,或进行互动。(Dewey, 1938, p. 32)

框 1.1 术语界定

扎根理论 (Grounded Theory): 由格拉泽和施特劳斯提出的一种从资料中建立理论的特殊方法论 (Glaser & Strauss, 1967)。本书中,扎根理论这个术语是在更加一般意义上使用的,表示源于质性资料分析的理论建构 (theoretical constructs)。

方法论 (Methodology): 一种思考及研究社会现象的方式 (way)。

方法 (Methods): 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程序和技术 (Techniques)。

哲学取向 (Philosophical Orientation): 一种世界观,它是构成方法论与方法的基础,并指导方法论与方法。

质性分析 (Qualitative Analysis): 一种审查资料和解释资料的过程,目的是从中发现意义、获得理解以及发展经验知识。

杜威和米德:实用主义的知识哲学

任何方法论都取决于知识(knowledge)以及认知(knowing)的本质,我们的方法论也不例外。在本书的一开始就安排一个对哲学知识的抽象讨论,我们并不是要吓唬新手研究者。放心,其余部分会具体得多。我们这里的目的是为随后要讨论的方法论奠定一个基础,并且提供一种洞见,关于从方法论上而言我们为什么做我们所做的事情。

本方法论的知识论(epistemology)经历了两步的演化(a two-step evolution),既涉及芝加哥互动论(Chicago Interactionism)传统,也涉及实用主义哲学,很大部分来源于约翰·杜威和乔治·米德的思想(Fisher & Strauss, 1978, 1979a, 1979b; Strauss, 1991)。后来的在这样特殊传统中受到训练的互动论者,写作或者触及有关知识论问题时,他们至少潜在地吸收了这些思想来源(Baszanger, 1998; Becker, 1982, 1986a; Blumer, 1969; Charmaz, 1983, 1991; Clarke, 1991, 2005; Davis, 1991; Denzin, 1989; Fagerhaugh & Strauss, 1977; Fisher, 1991; Fujimora, 1987, 1991; Gerson, 1991; Hughes, 1971; Lofland, 1991; Schatzman, 1991; Shibutani, 1991; Star, 1989; Suczek & Fagerhaugh, 1991; Wiener, 1991)。

对于那些可能不熟悉互动论或实用主义的读者,我们提供下面两段引言,虽然不是非常全面,但确实指出了这两种哲学非常重要的元素。根据布鲁默的说法,“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指的是一种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特殊的互动形式(Blumer, 1969)。他说:

(互动主义)其独特之处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人类解释或“界定”彼此的行为(action),而不是仅仅对他人的行为作出反应。他们的“回应”不是直接针对彼此的行为,而是建立在他们赋予这些行为意义的基础之上。(p. 19)

米德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实用主义及其起源的知识(Mead,

1936)。他说:

正是出于对行动(act)本身的兴趣以及对思维与行动关系的兴趣,当代哲学最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实用主义出现了。在心理学中,你可以称其为“行为主义的(behavioristic)”流派,对一种实用主义哲学的出现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然,有好几种来源,但行为主义是其主要的来源之一。(p. 404)

有影响力的实用主义学者的著述主要发表在 20 世纪的头三十年中(Dewey, 1917, 1922, 1929, 1938; Mead, 1917, 1932, 1934, 1936, 1938, 1956)。这些著述呈现了一种全新的知识哲学,作为我们自己方法论的理论框架,非常容易识别。例如,杜威和米德都认为,知识是通过行为和互动而建立起来的。杜威认为,“……观念(ideas)不是对是什么或已经是什么的陈述(statements),而是对将要实施的行为的陈述”(Dewey, 1929, p. 138)。或者更准确地说,知识是由具有自我反思性的人(self-reflective beings)行动(acting)和互动(interacting)(注意这些动词)中产生的。具体说,行动(activity)是由问题情境所引发,置身其中的人不能只是自动的或者习惯性的行动。根据杜威“一切反思性探究都是由一个问题情境开始,而问题情境不可能自行解决”(Dewey, 1929, p. 189)的观点,米德认为,“反思是在检验方法(means)中产生的,即在继续一个已经被检验过的行为时,为了对其进行某种假设而出现的”(Mead, 1938, p. 79)。行动者面临的问题是解决问题。它的答案是不确定的,而对它的判断只能根据由临时答案所指示的进一步的行动(后果)来决定。正如杜威所言,“对观念的检验,更一般地说对思维的检验,是通过由观念所引起的行动后果来发现的,也就是在刚刚成为现实的对事物的重新配置中实现的”(Dewey, 1929, p. 136)。

思维活动,即使是极快的无意识的瞬间,也有其时间向度。预想的行动目的影响了实际上采取怎样的行动,而且当行动者重新评估其效果时行动通常也会在中途改变。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也直接或间接地进入这些行动。杜威说过,“……反思性的思考

(reflective thought),即包含着推理和判断的思维,并不是原初性的。它在先前的现实(antecedent reality)中有过验证,就像在某种非反思性的直接知识中所揭示的那样”(Dewey, 1929, p. 109)。由于行动的时间性向度——在一个偶然性的世界中——所以实用主义者也关注过程。“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过程的世界里,未来,尽管是过去的延续,但并不是过去的简单重复”(Dewey, 1929, p. 40)。

另外,实用主义者并不认同当时流行的个人和群体(或集体)二元论观点。因此,不要说团队或组织,即使是个人,当他(她)发现或建立了对现实的某种新的理解,那也是因为他(她)在那些被继承了的思维方式中被社会化了。“无论是探究还是最抽象形式的符号系统,都无法逃离它们生活、运动和存在于其中的文化母体”(Dewey, 1938, p. 20)。因此,实用主义者相信集体知识的沉淀。(虽然今天这一点对我们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还是有知识哲学家毫不怀疑地赋予个人认知者以首要地位。)

总之,实用主义者密切关注自然科学(主要是生物学),将其作为一种模型。他们认为,在被同行经验性的验证之前,新知识都是暂时性的。在米德的《科学与个体思想者》中有一段总结是这样结尾的:

“在这两种过程中——一种是通过实验(即受控研究)来验证新假设的合理性以认识经验的结构,另一种是通过构想出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假设,个体得以运用其完整的特殊性,同时跟造就了他的社会保持有机的关系。”(Mead, 1917, p. 227)

无论是谁在做研究,其个人经验对该项研究及其潜在的思想过程都是至关重要的。杜威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相信人类经验的可能性,在经验的所有阶段,观念和意义受到珍视,而且将持续不断地生产并使用。但它们也是经验过程本身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从超越现实的外部来源超越输入的”(Dewey, 1929, p. 138)。

所谓的“有效性(validity)”,或者哲学家所谓的“真理

(truth)”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实用主义者一向热衷于这个观点纷争的问题。对它们的回答潜藏于所做的研究成果中。“对于要实施的操作(operations)的观念本质的界定,以及通过这些操作的后果来对观念的有效性进行检验,这就在具体的经验内部建立起了联系性”(Dewey, 1929, p. 114)。他们谨慎地强调,认知的行为体现了视角。因此,对“事实”的揭示不能与认知者的操作性视角(operative perspective)分开,它悄悄地潜入了他或她对某事的探究及其最终结论中。这种实用主义立场没有导致激进相对主义(这是当前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形式)。激进相对主义(radical relativism)认为,既然没有哪种叙述或解释能够被证明,那么我们就不能假定任何给定知识的确定性。和他们不同,实用主义者,以及那些在他们那个时代或我们的时代实践的科学家,必须做出一些关键假设。其中一个假设就是,真理等义于“就目前而言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最终它可能被判定为部分的错误,甚至完全错误。”另外一个假设是,尽管真理具有这样的性质(qualification),但知识的积淀并不是幻象(mirage)。世界并不是平的,银河系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同样的,电子的发现和它所有的理论及实践意义也不应被漠视。确实,有些人也许不相信进化论或地球是圆形的,但是一般来说,这些都属于积淀起来的信念。也许关于社会 and 人类活动的知识不那么具有累积性(cumulative),但实用主义者和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相信,某些社会知识肯定是累积的(cumulative),且为思想和社会的演化提供了基础。

实用主义者相对于(vis-à-vis)知识哲学的最后一个立场是,知识能够对实践或实践性事务有用。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假想在知识和日常行为之间有一个大豁口——另一种错误的二元论(dualism)。杜威说过,“我们的讨论很大一部分已经转向了一种对知识的分析。不过,这里的主题(theme)是知识和行动的关系;对于知识而言,结论的最终要旨在于它加诸于行动中的变化了的观念”(Dewey, 1929, p. 245)。实际上,它们(知识和行动)两者相得益彰。知识产生有用的行动,行动提出了要思考、要解决的问题,这样又转变成新的知识。在一个持续变化的世界里,偶然事件一个接着一个

的发生,实践和探究的这种相互作用也是连续的。(这在哲学上相当于阐明了科学家在数据和理论之间的交互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实用主义者并没有在日常思考(“常识”)和更系统控制了的科学典范之间画上一条严格的界限。他们没有阐明——但肯定会赞同——关于组织行动的观点,例如,它们大多很少是随意的,而是经过精心设计和评估的。然而实用主义者并不仅仅对实践或实际的东西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还有美学和伦理学方面的东西,语言和意义方面的东西,以及其他类似的、抽象的东西。米德认为,“实用主义绝不反对美学经验。像人类所有其他活动一样,它要面对自身的问题,要被欣赏和肯定,并通过反思来解决问题,它是一种被普遍承认的活动”(Mead,1938,p.98)。

以上这些关于知识和世界的假设,有一些是其他社会研究方法论所共有的,但也许不是所有的都这样。重要的是,要知道其他的方法论是由不同的假设所支撑的。因此,在“客观性”的名义下,方法论可能稳稳地将个人经验排除在研究之外。也因此,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自我反思的重要性,在其与“事实(reality)是什么”以及如何“认知”它的关系中可能被低估了。很明显,行动和互动对于实用主义者以及我们自己对世界和知识的观念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本体论:关于世界的假设

也许大多数使用我们的方法论的研究者(当然还包括那些只使用其程序的研究者)并没有反思过本书中介绍的方法背后的假设。也许他们认为,方法论的发展完全来自于实践。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这样,但方法论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我们的世界观或我们对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信念和态度的影响。

我们想要研究的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下面这段话表达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巨大流动性的宇宙;它不会也不能保

持静止。在这个宇宙中,分裂、分解和消失是出现、显露及聚合的镜像。在这个宇宙中,没有事物是被严格决定的。其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自然主义的分析得以确定,包括男人[以及女人]参与构建那些塑造了他们生活的结构的现象。(Strauss, 1993, p. 19)

什么样的理论能够适合上面一段话中认定的宇宙本质呢?一个复杂的,通常是充满歧义的世界,既是变化的,又有着阶段性的永恒;在这里,行动自身在今天是常规惯例,但明天也许就问题重重;在这里,答案变成了问题,而问题最终又产生答案。

我们将要提出一套假设,它们反过来支撑了本书中阐明的方法和研究策略。例如,我们对偶然事件的不可避免性的假设、过程重要性的假设,以及现象复杂性的假设,既指导着我们去审视问题,又指导我们应对日常的情境和事件。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人的条件在遭遇到事件和问题时所采取的行动、互动以及情绪反应是各种各样的。人类反应的本质创造了影响、约束、限制行动/互动的条件,并增进了其多样性的重组,这些我们可以从社会生活中发现。反过来,人们也塑造了他们的制度体系;他们通过行动及互动创造和改变着周围的世界。

下面我们将介绍一些适用的公理,它们非常特殊地存在于我们的方法概念的背后。它们大部分建基于上面介绍的实用主义和互动论哲学。当读者对本书越来越熟悉之后,应该很容易理解这些假设对本方法论而言的重要意义。这里我们再重复一下其中的一些假设*。

* 这一章的导言最初写于该书第2版。当时,由于考虑这一章作为质性研究入门教科书的开头而言过于复杂,Sage出版社删除了这一部分。然而,作者认为,删除说明奠定方法之基础的哲学部分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一部分正是为那些不熟悉施特劳斯其他著作的人确定其方法的位置所用。鉴于所有的围绕方法的讨论和争议,特别是关于扎根理论的讨论和争议,科宾相信,有必要将哲学背景材料纳入第3版当中。这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它与施特劳斯在他的《行动的不断重组》(*Continual Permutations of Action*, 1993)一书中所写得非常相似,而且我建议读者查阅该书,看看更加完整的描述。但是,本章当然还有我的(科宾)思想印记在里面。

假设 1 外部世界是一种符号性表象(symbolic representation),一种“符号的世界(symbolic universe)”。外部世界和内在世界都是通过互动创造和再造出来的。事实上,外部世界和内在世界之间并不存在划分(Blumer, 1969)。

假设 2 意义(符号)是互动的各个方面(aspects),并与意义(符号)系统之外的其他方面联系在一起。互动产生新的意义,……也改变并维持原有的意义(Mead, 1934)。

假设 3 行动根植于互动之中——过去、现在以及想象中的未来。因此,行动也承载意义,而且可以在意义系统之内得到定位。行动可以产生进一步的意义,二者都与进一步的行动以及它们根植于其中的互动有关(Mead, 1934)。

假设 4 在行动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偶然事件。这些事件会改变行动的持续、节奏,甚至意图,而这又可能会改变互动的结构和进程(Dewey, 1929)。

假设 5 行动伴随着暂时性,因为它们形成了持续时间不同的行动的过程。不同的行动者对一个行动的暂时性状况的解释可能由于行动者各自的视角不同而各不相同,但这些解释也可能随着行动的进行而改变(Mead, 1932)。

假设 6 互动的过程产生于共享的观点,若没有共享的视角,而行动或互动要进行,则必须要对观点进行协商(Blumer, 1969)。

假设 7 在童年的早期以及后面整个人生中,人类形成了自我,自我无形中进入人们所有的行动中,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其中(Mead, 1932)。

假设 8 反身性互动(彼此间相互反馈)可能先于、伴随着以及(或者)紧跟着行动(或显或隐地)。这些行动可以是行动者自己的行动或者其他行动者的行动。尤其重要的是,在很多行动中,未来包括在这些行动之中(Dewey, 1929)。

假设 9 互动行为可能伴随着对行动的回顾,对行动者自己的行

动和其他人的行动,以及对未来行动的预测。在行动/互动过程中作出的回顾和评估可能会部分影响甚至完全重塑(recasting)行动(Dewey, 1929)。

假设 10 行动并不必然是理性的。很多是非理性的(nonrational),或者通俗地说,是“不理性的(irrational)”。理性的行动还会被其他的行动者误认为是非理性的(Dewey, 1929)。

假设 11 行动有情感方面的特征(emotional aspects):将情感与行动区别开,将其看做是伴随行动的实体(entities),就是将行动的情感方面实物化了。我们不做这样的二元区分。你不可能将情感从行动中分离出来;它们是同一个事件流的一部分,一方引起另一方(Dewey, 1929)。

假设 12 手段—目的分析框架通常不适合理解行动和互动。这些常识和未经检验的社会科学框架对于解释人类行为来说过于简单(Strauss, 1993)。

假设 13 行动对于互动的嵌入(embeddedness)表明了一种行动的交织(intersection)。交织需要各个行动者视角之间存在着可能的,甚至可能性很大的差异(Strauss, 1993)。

假设 14 在一个互动过程中,几名或多名参与者需要对各自的行动进行“校准(alignment)”(或澄清)(Blumer, 1969)。

假设 15 行动者视角以及相应的互动的一系列主要条件是他们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及亚世界(subworlds)中的成员身份(memberships)。在当代社会中,这些成员身份通常错综复杂、相互交叠、对比鲜明、冲突不断,而且对参与互动的对方并不总是透明的(Strauss, 1993)。

假设 16 在互动的各个种类之间,一个非常有用的基本区分是日常(routine)互动和“有问题(problematic)”的互动。“有问题”的互动涉及“思考”,或者先超过一个互动参与者时,还会涉及“讨论”。“有问题”互动的一个重要表现还可以是“争论”——对议题或解决途径意见不一。也就是说,一个争议区形成了,它将会

影响未来的行动进程(Dewey, 1929; Strauss, 1993)。

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上述假设对方法论的启发意义可总结如下。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事物并没有简单的解释。相反,事件是多种因素一起作用并以复杂且常常是预料之外的方式互动而产生的结果。因此,任何方法论,如果想要理解经验与说明情境,就必须是复杂的。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应该尽可能多地在我们的研究中捕捉这种复杂性,同时又要认识到,完全的捕捉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努力从多种视角去看待事件,并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充分考虑差异性。我们意识到,为了理解经验,我们必须用一种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种族的、关于性别的、信息的及技术的框架将其放置在更大的事件当中,而不能将其从这些事件中分离开,因此,这些都是我们分析的基本方面。

过程是我们研究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知道经验,以及随后的任何行动/互动很可能是由一种对后果和偶然事件反应形成和转化而来的。我们并不是必然想要将对行动/互动/情感的理解简化为一种解释或理论框架,然而我们确实相信,不同层次抽象的概念构成了分析的基础。概念为专业人员之间的讨论及达成共同理解提供了路径。如果你没有一种语言,你就不能说话,而如果你无法说话,你就不会做事,而很多专门职业的基础仍然是做事(Blumer, 1969)。

最近的思潮对本方法论的影响

[上面所述反映的是施特劳斯和科宾的思想,而现在要写的,更多的则是反映科宾的思想。因此,在下面这部分,将使用第一人称]。

尽管上面所述的哲学和知识论假设为这里的方法论奠定了基础,但无疑,当代思想对我的方法论思想产生了一些影响。最

近几年的很多著作给予我无法估量的洞见,让我看到了过去一些做法的错误,并且偶尔令我反思——我怎么竟然被这样地“误导”了。但这就是知识的本质。知识随着时间而进步和变化,方法论也是这样。有些研究者简单地抛弃了传统的做质性研究的路子,而另一些研究者,像我一样,努力坚持过去研究的长处,同时与时俱进地向当下的方法看齐。和大多数人一样,基于“我是谁以及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从这些思想大杂烩中既选择了过去的一部分,也选择了当下的一部分,同时拒绝了其他一些思想。

无疑,我,科宾,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当代女性主义、建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著作的影响。我尤其敬佩克拉克(Clarke, 2005)和卡麦兹(Charmaz, 2006)两人的作品,以及他们如何将后现代主义和后建构主义范式应用到扎根理论方法论中,并接受邓金(Denzin, 1994, p. 512)的挑战,将解释性方法更加深入地搬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敏感领域。在这一节里,我想说明,我的分析取向是怎样受到质性研究最新方向的影响的,同时仍然最大限度地保持施特劳斯做质性研究分析的基本取向。

本书的读者应该记住,这是一部关于做分析的基础读物。我们的目的是要阐述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让初学质性研究的人能够理解。本书作者非常清楚,在做质性研究时,当超过了研究者的阐述或解释能力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当他说“解释是一种无法形式化的艺术”(p. 338)时,表明她同意邓金(Denzin, 1998)的这种观点。然而,没有方法的某种形式化,人们如何通过教科书来教学呢?我不认为,像人们更加自觉而系统地对资料进行思考那样,这一新版本也更加朝向方法的形式化;这也是为什么我将关于分析的演示章节放在书中的原因。我承认我并不完全了解质性研究方法论,而且本书的分析路径无法解决所有方法论的问题,或是回应所有当代哲学的争论。我相信,方法会演化以解决我们作为研究者在田野中遇到的问题。使用本书的读者将会在我使用的语言中、在讲述如何使用这些程序时,尤其是在我演示分析的那些章节中,注意到一些变化。

我无法用简单的语言从方法论上对现在的我进行归类,也无

法用一个简洁的术语介绍呈现在这里的方法。我和施特劳斯以及这本书都是很多事情的一个混合体。当谈论今天的研究和质性研究者时,邓金说得很好,“简单地归类显然行不通。任何心灵手巧的质性研究者,往往既属于这一类又属于其他类,能被同时归于性格脆弱类和意志坚强类(Denzin, 1998, p. 338)。我想说的是,这句话就是描述的我——脆弱而意志坚强。更具体地说,本版中我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意识到,并没有一个“实在”在那儿等着被发现(Geertz, 1973)。然而,我确实相信,有外在的事件存在,例如满月、战争,以及飞机撞到大楼。正如施万特所说,“你可以合理地认为概念和观念是被发明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同时主张这些发明符合真实世界中的事物”(Schwandt, 1998, p. 237)。然而,事件本身并不是我们研究中的议题,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他/她自己的经历或经验,根据性别、时间和地点、文化、政治、宗教以及专业背景来经历事件并赋予其意义。要理解这句话的正确性,你只要打开电视,倾听一群人讨论一件事情,例如总统的一次演说。虽然存在着大量的话语,但有时候所说的却完全互相冲突,尤其是,涉及政治时,对于事件的意义几乎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意见。在没有明确共识的情况下,对同样一个话题观察者的所见所闻其视角是千差万别的。令情况更复杂的是,从电视上听到和看到的意见经过了观察者对事件的解释过滤,这些解释建立在他或她个人历史和经历的基础之上,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一个研究者不可能完全理解或重新建构的情况。

我同意建构主义者的观点,概念和理论都是由研究者从故事当中建构的,这些故事则由研究参与者所建构,他们努力向研究者和他们自己说明和解释他们的经历和/或生活。从这些多重的建构中,分析者建构了他们称之为知识的东西。施万特说:

在相当不易察觉的意义上,如果我们相信心灵在知识建构中是积极主动的,那么我们就都是建构主义者。我们多数人都都会同意,认知不是被动的——一种将感觉资料往心灵的简单印刻——

而是主动的;心灵对这些感觉印象做出了某些活动,至少做了某种程度上的概念抽象。在这个意义上,建构主义意思是,与其说人类是找到或发现了知识的存在,不如说是建构或制造了知识。我们创造了概念、模型和图式来理解经验,进一步地,我们根据新的经验不断地检验和修正这些构念(constructions)。(Schawndt, 1998, p. 237)

虽然我意识到知识总是根据新的经验而持续发展,也许正是我心中的护士在说话,但我相信,分析工作需要某种程度的概念语言来谈论“研究发现”。没有一种概念语言,就没有讨论、碰撞、协商及发展一种基于实践的知**识**的基础。无法想象实践者走来走去做事情,却没有一套学科化的知识体系和经验,作为其行动的基础。知识也许并不是世界的镜像,但它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如果你是重症监护室的一名病人,你会希望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来照顾你吗?或者,你还是愿意要一个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理解任何理论都不应该教条地应用,而应该对理论进行重新评估和调整以适合当下的情境的护士?

我很实际,关于我想要通过我的研究所达成的目的。我有过护理背景,因此我想提出能够指导实践的知识。在总结我的实用主义和互动主义(Hughes, 1971; Park, 1967; Thomas, 1966)理论取向以及保持女性主义研究的社会公正目标中,我想改变社会,让人们生活得更好。但你不太可能看到我在街角带着标语或领导抗议活动。我最近参加了一场会议,在会议上,我提到并展示了我做过的一个小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是本书的一部分。一名观众回应说:“但我听不出你有多愤怒。”是的,我确实愤怒,实际上在做关于越战老兵这个小型研究的时候我很焦躁不安。但我不能让这种愤怒占据我的生活。从个人经历上来说,我是这种类型的人:宁愿用语言说教而不愿到大街上表达愤怒。我将反战的“游行”留给了比我年轻的人。我的希望是,在讲述这些越战老兵故事的时候,人们要理解年轻士兵面对的身体、情感和道德上的问题。也许他们的故事会引发社会公愤。如果有了足够的社会

公愤,也许就不会再将年轻的男女送去打仗。或者,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社会应该将越战老兵作为英雄来欢迎他们回家,为他们提供照料以及支持系统,因为他们需要去“适应”,以回归平民生活。

我同意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我们无法将我们是谁与我们的研究和分析分开。因此,我们必须对我们如何影响研究过程以及研究过程反过来如何影响我们进行自我反思。汉贝格和约翰逊说明了他们如何做自我反思,我也努力在这么做。他们说:

对于这种反思性分析,我们就重新阅读经过编码的访谈来审查充满了张力与矛盾的片段,或是有冲突的编码——那些在我们想要努力发现合理、有效的解释的时候通常已经被讨论过的段落。我们还阅读备忘录来回忆我们在访谈当中及之后我们的反应,以及在比较我们的编码时的讨论。(Hamberg & Johansson, 1999, p. 458)

我想,在做本书后面章节中的有关越战的小型研究项目时,我在写作备忘录对该研究如何影响了我做跟踪记录。确实,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要写下我的体验和感情,因为我常常感到如此不安。我真实地认同我听到和读到的这些故事。我已经被卷入。但我也关注我作为研究者的角色以及讲述我研究中的参与者的故事的必要性。我当然不愿意剥夺我的研究参与者的权利,而是要给他们阅读和对涉及他们的相关章节提出建议的机会。我告诉他们,访谈资料将用到一本方法论的书籍中,而他们也同意这样。我还要考虑伦理问题,要确保他们愿意将他们的话刊印出来,因为他们的有些话非常形象——他们的语言讲述的故事比我讲得好——我只是一个从来没有参加过战争的女人。参与者和我自己无法办到的是要将这些研究发现结合在一起,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共同的建构,因为故事确实将他们的语言和我的语言放在一起呈现。

虽然读者建构他们自己对研究发现的解释,这些是建构和重新建构,但这一事实并没有否定研究发现的重要意义,也没有否定可

以从它们之中获得的洞见。我相信,我们分享共同的文化,可以通过对话在这些共同文化的基础上达成共同构念(constructions)。概念给了我们对话并达成共同理解的基础。因此,我会继续相信概念的力量并提倡概念的运用。

同时,我想强调,方法和程序只是工具,而不是指令。研究者不应该执着于遵循一套编码程序,这样质性分析就失去了流动和动态的本质。和任何思考过程一样,分析过程应该是放松的、有弹性的,而且应该由与资料的不断互动中所获得的洞见所驱动,而不应该过分结构化,以及仅仅建立在程序的基础上。对这些有了反思之后,我准备开始讨论本书的目的:教学生如何做研究。

为什么做质性研究

为什么做质性研究?最常见的回答,可能也是最准确的回答是,研究问题应该决定用来实施研究的方法论取向。还有其他理由包括:质性研究让研究者能够获得参与者的内心体验,能够确定意义是如何通过文化并在文化之中形成的,以及能够发现而不是验证变量。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将做质性研究作为一种职业,我认为还有其他原因。致力于质性研究的人往往这样设计他们的问题,以至于唯一能够回答他们问题的方式就是通过质性研究。

致力于质性研究的人之所以倾向于质性研究是因为,与那些更加严格和形式上结构化了的量化研究方法相比,质性取向研究的流动的(fluid)、演进中的(evolutionary)及动态的本质更加吸引他们。质性研究者喜欢意外收获和探索发现的过程。统计可能是有趣的,但是能让质性研究者产生共鸣的是更多地了解人那种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质性研究者想要的并不是与他们的研究参与者之间的距离,而是在人性的层次上与他们建立联系的机会。质性研究者有着一种天然的好奇心,引导着他们研究那些让他们感兴趣的世界,否则他们可能没有机会接近。另外,质性研究者喜欢琢磨文字(玩文字游戏),在看似无序之中寻找有序,根据复杂关系来进行思考。对于他们,做质性研究是一种挑战,它将全部

的自我带到这个过程中。这不是诋毁量化研究者,也并不是说他们不具备这样的品质,这里仅仅是指出,致力于质性研究的人往往具有某种特定的风格。

虽然并非质性研究者所特有,但那些做出“好的”质性研究的人往往都有下面这些特征:

- 人文主义的爱好
- 好奇
- 创造性和想象力
- 一种逻辑感
- 在承认规律性的同时也能够承认多样性
- 冒险的意愿
- 容纳歧义感和模糊性的能力
- 在田野中完成研究工作的能力
- 愿意将自己作为研究工具
- 信任自己及能够理解自己研究的价值

那些经过我们训练的研究者,往往真的很喜欢与资料打交道。他们喜欢分析资料这种精神挑战。在分析材料时,他们不怕依靠和运用自己的经验,因为他们抛开了传统“客观性”的观念,也不担心使用个人经验的危险。我们以前的学生都将他们的观念看做是暂时性的。即使公开出版之后,他们仍然将他们的研究看做是可修改的而且对批评和反驳持开放态度,因为新知识在不断累积。就他们的研究本身来说,我们所训练的研究者往往比较灵活,这是在我们研讨班和偶有的团队研究不断得到强化的一个特点,他们在这里向各种批评敞开,能够在小组讨论的贡献与吸纳中享受思想的玩味。例如,看看下面这段表述:

我是一个写作小组的成员,我们一个月会见一次,已经好几年了。我们传阅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并进行批判,有时候我们帮助渡过分析难关。最近,我们小组的一名老成员回来了,她向我们描述了她想在另外一个地方发起成立一个类似的小组的失败经历。她这个小组里的参与者都模仿我们这个小组的程序,在组

织形式上模仿,但是他们都非常苛刻地看待彼此的研究,而且更多地关注竞争式的发言,而不是真正的合作。我们的小组试图分析我们为什么是成功的,意识到和我们中有四个人参加过扎根理论(研讨班)很有关系。然而,并非只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有了共同的分析焦点,因为实际上我们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已经学会了以一种合作和支持的方式在一起做研究。(Leigh Star as cited in Strauss, 1987, pp. 303-304)

灵活性和开放性与学会保持一定的模糊性(ambiguity)联系在一起。急切要求避免不确定性以及迅速完成研究,这种想法需要调和,要意识到现象是复杂的,且它们的意义也不容易把握,更不是想当然的。研究本身是一个过程,一个我们以前的学生都喜欢的自我反思的过程。在做研究的过程中,他们享受思想的流动,而不仅仅是实体性的东西(substantive ones),因为他们知道,理论思想有其自己的宝贵价值。不过,他们对理论持有怀疑,无论理论看起来多么迷人,除非它们最终扎根建立在与资料的积极互动之上。

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多数研究者可能希望研究对非学术的读者也有意义。这是因为,质性研究者非常严肃地收集他们所研究的人们的语言和行动。或者说得更深刻一些,“我知道,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不要脱离人们的生活,他们应该和人们生活的世界以及他们对其的思考建立直接的联系。”(B. Fisher,引自:Maines, 1991, p. 8)。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受过质性分析训练的研究者,几乎都完全“沉浸在研究中”,这虽然并不总是“位于(我们生活的)前景中,但却从来没有消失过”(A. Clarke, 私人交流, 1990. 3. 21)。

这种对研究过程的专注、投入,以及因此带来的一种强化了的整体感,在另外一个学生的书面描述中反映出来。我们大量引用她的这段文字,因为她的话生动地突出了我们有关质性研究者及其研究工作特征的很多看法。在公共卫生领域接受训练之前,她已经在一家苏族印第安人(Sioux Indian)的住处工作了三四年,这让她全神贯注于这样的问题:既然这些观念与我们的有很大差

异,那么他们的基本健康观念是什么?在田野中从事研究数月之后,她回到研讨班,很快她在一篇给导师的备忘录中这样评说:

这些担忧和恐惧(全班可能会误解她的非西方的、跨文化的资料)在两个小时的课程上被系统而慎重地消除了。我非常仔细地观察并专注地倾听人们所说的,以及他们如何将观念和想法渗透到资料中去,当需要更多的信息时谨慎地向我提问,而不是在得到重要的补充之前就直接得出结论。学生们似乎是在资料中仔细寻找丰富性,找到关键的问题,反复对比、玩味,寻求更多的意义,指出不同情境的多种可能解释。我非常高兴,在这些分析者试图寻找的和我在研究中听到的及看到的之间有如此多的一致性。这些课程的完整性和精确性方面都在这种教学的形式之下得以保留和持续,也即(因为它无法脱离)互动主义知识论和质性研究的概念和分析框架的结合(K. Jurich,引自: Strauss, 1987, p. 304)。

小 结

像柯立芝(Coleridge)和《忽必烈汗》(*Kublai Khan*)一样,我从梦中醒来,但由于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梦,只是思想的萌芽,它们就在这儿……(Anselm Strauss)

人们选择做研究是因为他们都有个梦想,即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他们的洞见和理解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但有梦想还不够。梦必须要取得成果。本书的目的就是为质性研究者提供一种实现他们做研究之梦想的工具。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法,而且我们也承认这一点。然而,通过我们自己作为研究者和分析者多年的经验,我们确实能为读者提供一些智慧语言。我们呈现了一些分析程序和技巧——我们发现这些非常有用,而且这些程序和技巧后面的思想为学生提供了某些东西,当学生面对大量资料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们可以转过来求助于这些东西。我们通过研究项目的演示,带着学生看我们自己是如何分析资料的,希望以此给学生以启发。作者知道,对于那些已经收集到大量的质性研究资

料,但却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资料的人,这有多难。

虽然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穿越世界,训练每一个对学习质性研究感兴趣的人,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希望来写作本书:我们能够成为“不在场的教师/导师”。像所有的好教师一样,我们的目的不是提供一本食谱一样的书。相反,我们的目的是为资料分析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一个使学生能够追求他们的职业生涯并达到他们梦想所达到的研究高度的基础。虽然学生开始做质性分析的时候,通常需要指导,而且渴望结构,但是做研究的正确方式并不只有唯一一种。

质性研究分析包括很多东西,然而它并不是一个能够严格规定的过程。毕竟,它所需要的是一种对资料中所发生的事情的直觉;相信自己和研究过程;以及同时保持创造性、灵活性和诚实面对资料的能力。质性研究分析是研究者必须自己感知自己找路的东西,某种只能通过做才能学会的东西。有些使用本书的人会对发展“扎根理论”感兴趣,而其他研究者的目的可能是深入而丰富的描述,或者也许只是界定基本主题。无论什么样的研究目的,我们认为本书将都非常有用。

这里的介绍结束之后,我们想带着我们的读者开始一个获取知识的旅程——一段我们希望在未来数年都能够给予读者以启蒙、赋权和鼓舞的旅程。

要点总结

选择做质性研究有很多理由,但最重要的也许是渴望超越已知和进入参与者的世界,从参与者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从而做出新的发现,继续发展经验知识。质性研究者应该具有好奇心、创造性,而且敢于相信自己的直觉。尽管做质性研究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和研究取向,在本书中我们呈现了一种方法论取向以及研究程序,我们认为对分析质性资料非常有用。我们的方法源于芝加哥学派的互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结合。这些传统指引着我们

完成资料收集和分析。在资料收集和分析过程中,我们要寻找很多东西,并提出大量的问题,但是我们分析所依赖的基础却是概念。

虽然我们的兴趣在于人们如何经历事件,以及他们如何赋予这些经历以意义,同时我们还考虑到,任何对经验的解释,如果不能做到下面这些都是不完整的:(a)将经验定位在其所根植于其中的更大的条件框架或情境之内;(b)描述行动/互动/情感过程或它们进行中的和变化中的形式,人们用它们来回应那些引起了行动/互动的抑制的事件和问题。我们还寻找后果,因为它们回过头又成为后面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本书的读者不必采取我们的理论立场也会发现本书的用处。很多程序,例如比较、提出生成性的问题(generative questions)以及理论抽样,并不是基于理论而是来自于施特劳斯早期与格拉泽的著作(Glaser & Strauss, 1967),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们,无论他们的研究目的是理论建构、深描或案例分析。

思考、写作及小组讨论活动

1. 花一些时间思考你自己个人及专业的哲学取向和对世界的信念。写一两段话描述你认为这些哲学取向和世界观会怎样影响你做研究的取向。与班级同学或同事分享你的思想并进行讨论。
2. 是什么吸引你去做质性研究?你认为自己的个人特质将如何提高你做好质性研究的能力?
3. 在小组中,讨论你认为好的质性研究者的品质有哪些?这些品质可能怎样通过恰当的导师指导和教/学环境来培养。

实际考虑

……你迫切地要交流、教导或取悦,要维持优雅、愉快或超然状态,让真实或想象的事物出现。但是你不能指望这就会发生。这是一个持之以恒和坚信不疑的事情,也是一个艰苦努力的事情。因此你最好是继续前进,而且从现在开始。(Lamott, 1994, p. 7)

框 2.1 术语界定

非技术性文献:传记、日记、文档、回忆录、手稿、录音、报告、手册,以及其他可以用作原始资料的材料或补充访谈和田野观察记录的材料。

难题(Problem)*:研究的一般问题或焦点。

问题(Question):需要通过研究来解决的具体问题。问题确定项目的研究范围,指出了资料收集和分析中要使用的方法。

敏感性:在资料中发现细微差别和线索用来推断或指出意义的能力。

技术性文献:研究报告及具有专业和学科写作特点的理论论文或哲学论文。

* 作者在本书中将 Problem 和 Question 区别开,这里暂时将前者译为“难题”,后者译为“问题”。但在汉语的实际应用中,它们都可以作为“问题”,具体意义要根据具体的语境来判断或者在前面添加相应的修饰词。一般来说,这里的 Problem 相当于导致研究选题的问题,或者是研究问题本身;而 Question 相当于针对选题而提出来需要研究的具体内容,是对这些具体内容的提问方式。本书后面的翻译中,除非在将这两者进行比较,否则都根据语境译为“问题”或添加相应的修饰语。——译者注

导 论

对没有经验的质性研究者,做质性分析是一个令人畏惧的过程。之所以令人害怕是因为有一些压倒性的担忧:“我的做法正确吗?”“我诚实地对待资料没有?”很自然,研究者都希望尽他们所能做出最好的研究,即使有经验的研究者也会问这些问题。然而,我们希望读者放心,这种担心没有必要。质性分析建立在自然的思维方式基础之上。引用沙茨曼的话,即“本文的基本观点认为,分析是自然的、一般的思维过程,它是在早期社会生活中和我们的语言一起习得的,而且几乎总是在经验中习得”(Schatzman,1986,p.1)。

我们在本书中将要讨论的很多内容听起来都很耳熟。例如,在分析中,我们建议分析者根据概念来思考,因为概念形成了共同理解的基础。想到“椅子”这个词,立刻,某种可以坐的东西就浮现于脑海。在分析中,我们还建议分析者要对资料进行提问。当你遇到你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时,考虑你最初的想法。你可能会问,“这是什么?”或“这里发生了什么?”另外,我们鼓励分析者在不同资料片段之间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和差异之处。当你要出去购买新轮胎时,你会对品牌进行比较并问:“哪一种轮胎最物有所值?”大多数时候,概念化、提问以及进行比较都是无意识发生的。它们是个人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居于其中的世界而使用的工具。日常生活和做研究分析之间的差异是,在研究分析中,研究者采取一种更具自我意识和系统性的取向进行认知。

当我们一起坐下来开始分析资料时,分析建立在日常思维方式基础之上的概念对学生来说就显而易见了。我们的研究生总是说:“一起做分析和在书中读它有着很大的差异。”确实如此!在我们的分析研讨会上,当我们结束了活动并提醒他们,“看,你们正在用概念进行提问、比较、讨论”,学生这才意识到他们正在做研究分析。经验告诉我们,在课堂上教授分析比在书本中要容

易得多。

关于分析的讨论还为时尚早。在研究者能够做分析之前,他或她必须有一个研究项目和一些资料。因此,让我们将有关分析的讨论暂时放一放。本章的目的是要为正准备开始做研究项目的人提供一些实际的建议(practical suggestions)。本章首先讨论选择研究问题(research problem)以及提出具体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然后用一小节来介绍资料收集。本章的后面,将讨论有关技术文献和非技术文献的使用问题。最后,用一小部分讨论关于理论框架的内容。

选择一个研究问题

做研究一个最困难的方面是选择一个研究题目(topic)。题目是研究者必须要与之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的东西,所以它必须是某种有趣的东西。与选择题目有关的两个主要问题是:(a)我如何寻找一个我想要研究的问题?(b)然后是,我该如何充分地缩小我的研究问题,使它变成一个切实可行的研究项目?

对于新手研究者,选择一个题目,并界定其范围看起来尤其困难,因为在质性研究中研究问题并不像在量化研究中那么容易结构化。质性研究一般由一个宽泛的问题开始,通常并没有预先确定的概念。概念是在资料中寻找并建构起来的。正是对发现的充分敞开使得做质性研究如此有趣,但却让新手研究者产生某种胆怯。

问题的来源

质性研究中的问题来源和其他形式研究的问题来源并没有多大的差异。有四个主要领域:

- 导师建议或指定的问题
- 来自技术文献和非技术文献的问题
- 来自个人和专业经验的问题

• 研究本身出现的问题

下面我们将分别讨论每种问题。

首先是导师建议或指定的问题。一种获得研究问题的方式是向正在一个感兴趣领域做研究的教授寻求建议。他或她常常有正在研究的项目,而且欢迎有研究生来做项目中的一小部分。这种寻找问题的方式往往增加了参与到一个可行且有意义的研究问题中去的可能性。因为在一个特定的具体研究领域,更有经验的研究者早已知道需要做什么。另一方面,以这种方式达成的选择也许并不是学生最感兴趣的。记住无论选择什么研究问题,研究者必须要能够持之以恒,因此最终选择的应该是能够引起他或她好奇心的问题。

指定或建议的问题来源的另一种变化形式是,密切关注专业或同行对某个“如此这般”的研究的评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研究不但有用而且有趣。这常常是一种更加令人愉悦的问题来源,如果研究者对该领域有某种偏好那是最好。例如,一个女运动员可能会被下面的话激发出兴趣:“我注意到,进行锻炼的妇女往往会感觉身体更加舒适。”这样宽泛而且开放的陈述能够引出各种类型的问题。妇女对身体和锻炼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学校体育运动、健康信念、媒体以及文化倾向对妇女锻炼的意愿产生了哪些影响?经常锻炼的妇女通过什么样的过程开始了解他们的身体及其力量和限度?妇女最可能参加的体育活动是在什么样的范围中?为什么是这些活动而不是其他活动?参加体育锻炼的妇女和不参加体育锻炼的妇女在身体体验上有区别吗?体育锻炼的身体体验如何转化进入到妇女生活的其他方面?

关于指定的研究问题,还有一个变数是关于某些题目的研究是否能够获得资助。实际上,导师会从方向上引导学生进入可以获得资助的研究方向。这是一种相当合理的建议,因为这些通常是特别需要的问题领域。

研究问题的第二个来源是技术文献和非技术文献。文献可以在很多方面激发研究。有时候,它指出一个相对没有涉足的领

域,或暗示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题目。还有些时候,在已有的众多研究和著述中存在着矛盾或模糊。这些差异表明需要一个能够帮助解决这些不确定性的研究。另外,研究者对某一个主题的阅读可能发现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来解决老的问题,即使该问题过去已经有过较为充分的研究。有关该问题领域的东西及其相关现象仍然模糊,这些未知的,如果被发现,可以用来重构我们的理解。而且,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研究者也许会遇到和自己经验相冲突的研究结论,这可能会产生解决该冲突的研究。最后,阅读也许只是激发对一个主题的好奇心。当一位潜在的研究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怎么样”,而且发现该问题还没有答案,这时候他或她就有了一个研究领域。

研究问题的第三个来源是个人和专业经验。一个人也许经历了离婚,而且想知道其他妇女或男人是如何经历他们的离婚事件的。或者某人可能在他或她的专业领域中或工作场所遇到一个问题,而且没有现成的答案。专业经验常常导致这样的判断,即某种专业特征或实践缺乏效益、效率、人性或公平。因此,人们相信,一个好的研究也许有助于纠正这样的状况。有些专业人士返回学校去攻读更高的学位,因为他们被改革的热情所激发。他们研究问题的选择就建立在这样的动机基础之上。通过专业或个人经验的途径(route)选择一个研究问题似乎比通过建议或文献途径选择的要更冒险。但事实并非必然如此。潜在研究者的经验这个试金石(touchstone)比其他更加抽象的来源也许是一个更具价值的关于一个潜在的成功研究工作的指标。

第四个来源是研究自身。研究者进入田野的时候可能对想要研究什么有一个一般性的概念,但没有具体的研究问题领域。做一些初步的访谈和观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研究的方式。如果研究者仔细倾听或观察被研究者的讲话和行动,分析会引导研究者发现被研究者生活中重要的或有问题的(problematic)主题。注意被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这种辅助检测是一个研究项目应该聚焦的关键之处。不可否认,虽然没有唯一的有意义的焦点,但是通过谨慎审视被研究者考虑的问题而发现的具体焦点降低了研究

问题不重要或完全无关紧要的风险。思考下面的例子。

一个从博茨瓦纳来的学生,正在修一门田野研究的课程,她在一位老住户的家里(a senior resident home)研究“老年美国人”时,感到非常绝望。首先,她在进入田野时的观念似乎并不符合她的所见、所闻。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么“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她最初带入研究现场的可能是来自三个不同来源的假设。她还年轻,所以对老年人有着某些不正确,甚至有些根深蒂固的成见。而且,她是一位外国人,她是根据她自己的文化来思考。其次,她是一位新手研究者,还没有学会如何从被研究者自身关心的问题中寻找线索,而且她还不熟悉如何让这样的信息来指导她选择研究问题。在该学生的例子中,她还面临另外一个困难。她自愿为一家社会工作机构服务,机构有着自己的规程,其中包括对与这些老人相关工作的评估。因此,该机构一直督促她要获取一些特定的信息,但她认为这些信息与这些老人的生活或利益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她要对该机构负责。最终,通过密切倾听这些老人,她提出了一个意义重大的研究问题。

当然,任何人,只要他对自己周围的世界感到好奇或关心——以及任何愿意去冒险的人——在经过审慎的思考之后,找到一个研究的问题领域不应该有太大的麻烦。下一步就是提出适当的具體研究问题(question)。

具体的研究问题(Question)

任何研究都需要一个某种类型的问题(question)来指导探究。然而,质性研究问题往往不同于量化研究问题。

界定议题(Issues)

研究者提出研究的方式很重要,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来做研究的方法。这里有个两难问题。研究者之所以选择质性研究,是因为问题领域以及源于问题领域的问题(question)暗示这种形式的研究将最富有成效?或者,投身于质性研究的研究

者设计问题(frame the question)以适应方法?如皮尔斯所指出的,决定研究取向的过程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呢?(Pierce, 1995)这个问题(issue)很难回答,因为答案不清楚。虽然基本前提是,研究问题(question)主导着研究方法,但是我们认为,个人往往要么倾向于做质性研究,要么倾向于做量化研究。例如,由于我们(本书作者)的背景受到实用主义和互动主义的吸引,我们似乎很自然地偏向于质性研究方法。因此,即使一个问题领域可以使用质性研究,也可以使用量化研究,我们仍倾向于以能够让我们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开展研究的方式提出问题。我们没有理由在这一点上喋喋不休;我们只是想强调,对于有些问题,很明显一种形式的研究比另外一种形式的研究要好,因此研究者不但要诚实地面对研究问题,而且还要诚实地面对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研究偏好。

而且,即使研究者选择使用质性研究取向,仍然存在如何在众多质性研究方法中选择哪种方法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质性研究取向,因此,想要对每一种方法都做一个介绍则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想要阅读各种方法,我们建议读者可以参阅这些作者的著述:Berg, 2006; Creswell, 1998; Denzin and Lincoln, 2005; Flick, 2002; Gilgun, Daly, & Handel, 1992; Marshall & Rossman, 2006; Morgan, 1996; Morse, 1994; Morse & Field 1995; Silverman, 2004; Somekh and Lewin, 2005。有三本新近出版的著作,它们采取不同于本书中介绍的做扎根理论研究取向:卡麦兹(Charmaz, 2006)采取了她称之为“建构主义”的取向,克拉克将她的方法称为“情境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Clarke, 2005),而古尔丁将自己的书定位于管理、商业和市场研究人员(Goulding, 2002)。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有助于建立研究的边界。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涉及难题(problem)的所有方面。因此,即使在质性研究中,恰当地设计问题(question),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一个研究难题(problem)需要使用质性研究取向和量化研究取向的混合方法。这又引出了另外一整套方法论议题,它们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对混合方法感兴趣的读者,

我们建议阅读:Creswell 2003; Greene, Kreider, & Mayer 2005。)

设计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

质性研究中的问题是什么样子的?它们与量化研究中的问题有何不同?为什么?质性研究常常是探索性的,它更多的是提出假设而不是验证假设。因此,必须要以这样的方式设计研究问题:为研究者对主题进行一定深度的探究提供充分的自由和弹性。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的背后还包含这样的假设,即某个给定现象所有有关的概念还没有被识别(identified),或没有得到充分发展(developed),或理解不充分,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增进理解。虽然质性研究中的研究问题(questions)往往比较宽泛,但它们并没有宽泛到会产生无限可能。问题的目的是引导研究者走进资料,只有在资料中,才可以探究对研究中的个人、组织、群体和共同体来说重要的议题(issues)和难题(problems)。

质性研究中的研究问题是一个陈述(statement),它指明了要研究的主题领域,并告诉读者研究者感兴趣的特殊主题(topic)是什么。人们会怎样写一个质性研究问题?这里有一个例子。“患有慢性并发症的孕妇如何管理她们的怀孕和生活,从而确保安全生产?”虽然人们可能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一项量化研究而言太一般化而且不具体,但对于质性研究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Corbin, 1993)。这个问题告诉读者,该研究将研究孕期的妇女,且患有慢性并发症。此外,该研究将要从妇女的角度研究如何管理怀孕和日常生活;这意味着,不是从一名医生或任何其他人的角度。而且,最重要的是,研究中的妇女希望她们的怀孕有好的结果——也就是说,她们希望保住这个孩子。

当然,在质性研究中,对于一个研究问题获得尽可能多的视角是非常重要的,在上面的研究中,研究者可能也想要获得有关医生、护士、配偶以及其他重要人物对于慢性病、妊娠以及所有的相关问题所做的事情和所说的话的资料,因为这些互动会影响妇女如何看待和管理妊娠。然而,正如问题所指出的,焦点仍然是妇女。保持焦点可以防止研究者被不相关的和没有结果的问题

分散注意力,并不是要试图获得全部可能性的资料。例如,这里不是要研究高危妇产科的整个世界,只有那些检查和治疗——因为是参与者(即孕妇)要接受的实际或潜在的妇科治疗而进入研究视野,才成为研究的一部分——需要追踪。这对慢性病情况是同样的。仅从逻辑上,在计划的研究中,并非要研究所有慢性病及其治疗范围。只有慢性病或其治疗的那些进入并影响了参与者的妊娠的方面,才会成为研究的内容。

其他相关要点

在质性研究中还有其他一些我们想要强调的要点。质性研究不必限定于个人。研究可以关注家庭、组织、行业以及其他丰富多彩的研究领域。这里有一个例子,来自于文献的有关互动和组织研究的问题。在对制度结构边界、结构动态以及渗透性的本质的研究中,舒瓦尔和米兹拉希提出了下面这些问题:“组织的和认知的边界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生物医学实践者允许竞争对手的侵入?其他实践者如何‘适应’诊所和医院结构的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在实践环境中,可以看到关于接受或机制或惯例(rituals)?”(Shuval & Mizrahi,2004,p.680)

在他们对三代人的家庭的传记研究中,罗森塔尔和沃尔特提出了下面的问题:“有着经历过的粹时期的家庭和集体的过去,三代家庭在今天是怎样生活的?第一代人的过去,以及他们自己处理过去的方式对他们后代的生活以及他们后代接受家族历史的方式产生了哪些影响?”(Rosenthal & Völter,1998,p.297)

请注意上面的问题是多么的宽泛,以及他们如何在表达感兴趣的问题的同时限制了研究范围。质性研究有趣的一面是,虽然研究者带着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开始研究,但是在研究过程中问题却不断地出现,这些问题更加具体,而且引导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及分析。当读者在本书的后面阅读到有关分析的章节时,这一点会更加清晰。

资料收集

质性研究的优点之一是它有很多种资料来源。研究者可以使用访谈、观察、录像、档案、图画、日记、回忆录、新闻报纸、传记、历史档案、自传以及其他这里没有列出的资源。在任何研究中,研究者都可以单独使用或组合使用这里所列的一种或几种资料来源,这取决于要研究的问题。其他的考量包括,希望就同样的问题进行三角检验或获取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料,例如将观察和访谈结合起来,然后可能还要增加文献资料来验证或增加其他来源的资料。由于有很多优秀的书籍对资料收集技巧有过深入的讨论,例如,如何做访谈或观察,所以我们将不再详细介绍过程本身。相反,我们将主要讨论与资料分析有关的更加一般性的资料收集问题。(关于访谈的优秀著作见 Gubrium & Holstein, 2001; Weiss, 1994;关于讨论田野工作或观察的著作见 Lofland, Snow, Anderson, & Lofland, 2006; Patton, 2002; Schatzman & Strauss, 1973——一本古老的经典。)

尽管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分析的质量,但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研究者正在分析的材料的质量。人们有时候认为,不经过训练或不需要准备他们就能够走进田野进行访谈或观察。这些人常常会失望,因为他们的参与者未能提供很好的信息,得到的资料即便作最乐观的估计都很稀少。访谈和观察是要经过训练并要通过实践才能够获得的技巧。

我们的经验已经说明,最能得到丰富资料的访谈是那些非结构性访谈,也就是说,它们不是通过任何事先确定好的一套问题引导出来的(Corbin & Morse, 2003)。它需要练习,带着一个开放的心灵和一个开放的计划坐下来,不要让紧张妨碍了信息的自由流淌。例如,可以这样问:“能告诉我你的癌症经历吗?我想听你自己讲出来的故事。在你讲完你的故事之后,如果我还有其他问题或事情不清楚,我会问你的。但现在请随便说。”

运用非结构性访谈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对访谈过程没有影响。

米什勒将访谈看做是研究者和被访谈对象之间的一种对话。他说:“提问与回答都是说话的方式,它们都扎根于并依赖于文化上共享的而且常常是默会的假设之上,后者假定了如何表达和理解信念、经历、感情和意图”(Mishler, 1986, p. 7)。他还解释了访谈是如何在结构和意义上被发生在各参与方之间的提问、停顿、脸部表情以及言语的和非言语的交流而形塑的。

对于研究新手,访谈的一个最大困难是访谈中面对的沉默时间。两位德国传记研究者,黎曼(Riemann, 2003)和许策(Schütze, 1992a & 1992b)已经形成了一种访谈和分析的风格,它将沉默考虑在内(需要其他做传记访谈和分析的例子,请参阅 Rosenthal, 1993)。

对于质性研究者,遇到一个人,同意接受访谈,但一旦访谈开始却没有什麼可说的,让研究者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是有些备用的问题。通常的问题是,这个人只是不知道说什么,或者是对访谈的情境不舒服。问几个问题常常会让研究参与者感到放松,而且激发起他或她的记忆,这样他或她就会变得更加健谈、更加主动(spontaneous)。有时候,一个人暂时还没有思考该问题。或者,可能是一个话题引起了很多的情感,参与者不得不沉默一会儿以恢复镇定。

一个敏感的访谈者知道什么时候退居一边,让被访者引导着什么时候重新开始访谈。研究者发现,最有趣的事情是,只要录音机(笔)一关上,被访者常常会提供某些最有趣的资料。我想,被访者有很多理由等到录音机(笔)被关上之后才会讲述最后的“花絮(tidbits)”。在访谈结束“泄露真相”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访谈过程为被访者提供一个深入谈论有关话题的机会,在赋予他们自己的行为其他洞见之前他们还没有过多地谈论这些议题。最后这些话是他们想要分享的总结(afterthoughts)。另外一个原因,且也许更有可能的解释是,当录音机(笔)开着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揭示他们认为是“敏感信息”的东西会不舒服。他们并不介意研究者使用这些材料,否则他们就不会说出来,但是,尽管有了保证,在记录之后录音将被销毁,但一想到通过录音可能识别

出来,这令他们感到不舒服。除了录音机(笔),我总是随身带着铅笔和纸,所以我提出请求允许记下这些额外的信息。被访者总是同意,不过他们的同意可能是由于访谈者和被访者之间的权力差异以及由于礼貌的原因。

研究者可能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同意做研究参与者;如果有问题的话,研究者所能做的就是请求允许,而且不但要对被研究者的语言回应敏感,而且要对他们的非语言回应也要敏感。也许正是这一点,我们要对田野研究伦理作一些评论。

大多数研究机构伦理委员会成员的职责就是确保要有保护措施来保证研究参与者的匿名权和保密权,以及保护他们的健康和福利,以免在生理上或潜在的社会/心理上影响研究。另外,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有责任像对待家庭成员一样对待参与者。一个可靠的原则是,如果你认为你不喜欢这样,那么参与者可能也不喜欢。还有另外一点,人们有权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有时候研究者对访谈材料或某些被观察的东西觉得不舒服或尴尬。然而,参与者却不这样想。实际上,他们想他们的故事就在那儿。当读者阅读第8到第12章的时候,这一点就会更加明白。

另外,研究者不能对其他人的话进行评判,除非这些话可能会对其他人产生意外的伤害。作者承认,在研究中,伦理是一个密切相关的话题。鉴于长篇大论地讨论伦理不是本书的范围,我们为读者推荐朗和约翰逊(Long & Johnson,2007)以及派珀和西蒙斯(Piper & Simons,2005)的著作。

做观察或田野研究对新手研究者通常更加困难。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质性研究者的资料收集过程中,访谈比观察使用得更多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有些研究者认为田野研究只属于人类学家。另外,做观察是一个更加费时间的事情,而且会对别人造成侵犯,因此研究者自己都不愿意使用这种收集资料的形式。但观察能够为质性研究者提供大量的信息,因此在选择资料收集模式时,应该考虑将其作为一种模式。观察法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常常说他们在做一件事情时而实际上却在做另外一件事情。要知道这些,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观察。另

外,人们可能意识不到,或者无法说出他们与他人之间在互动中发生的微妙之处。观察将研究者置于行动发生之处,在这里他们能够看到发生的事情。巴顿认为,“创造性的田野研究意味着调动研究者自己的所有感官去体验和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创造性的洞察来自于直接投身于研究的情景中”(Patton,2002,p.302)。

观察有其自身潜在的不足。研究者可能会基于观察赋予行动/互动以意义,却不检验其对参与者的意义。将观察和访谈结合在一起,或者留下开放的可能性,与参与者一起验证解释,这总是有益的。巴顿指出,“非语言行为很容易被误解,尤其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因此,只要可能及合适,已经观察了那些看起来非常重要的非语言行为,就应该努力跟踪它们,希望直接从中发现非语言行为的真正意义”(Patton,2002,p.291)。

在做观察的时候,研究者要寻找的是什么?研究者首先要坐下来或站出来,让场景自然展开。最终,某些有趣的东西将会抓住研究者的眼睛。然后观察就聚焦于其上。如果该事件证明意义重大,研究者就记下发生的事情、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情,以及谁说的。但是,想要抓住情境中事件的每一点是不可能的。从这些作者的观点来说,在做访谈和/或观察的时候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概念驱动(drive)着资料收集和研究分析。但这些概念来自哪儿呢?让我们从我们对护士长们的研究中为大家举一个例子(未出版)。科宾第一次田野研究,要见一位护士长,她为这一天做了准备,跟着她一整天,记下了护士做的或说的所有的事情,而且还记下了情境,最后还在观察记录后面写下了需要护士长进一步解释的事件的问题。(在医院繁忙单位里对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作记录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将我的观察记录限于护士长以及和她相关的行动和互动。)然后去科宾和施特劳斯一起分析该笔记。来自分析的概念成了后面观察的基础,虽然不完全是。后面每一次的观察为跟踪前面发现的概念提供了机会,而且还发现了新的概念。如果后面的观察不能为概念提供资料,观察结束的当天,研究者要就概念进行询问。

在访谈或观察以及随后的写作中,保密都是一个重要的议

题。洛弗兰德等人认为,“田野研究者对于他们研究的那些人主要的义务之一是通过‘保密协议’给予匿名担保——承诺研究报告中不会使用真实姓名、地点等或者将由假名替代”(Lofland et al., 2006, p. 51)。

资料收集和分析期间的反身性(Reflexivity)是质性研究中另外一个重要的考虑。过去,我们都知道,在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时候,研究者会经历伤心、愤怒、幸福,以及对是否许可的回应,然而我们从来没有很好地思考研究者自己的感情或反应。毫无疑问,这些情感被传递到参与者身上,这样,反过来,在访谈或观察活动中,参与者会通过不断地调整他们的立场来与研究者的反应进行互动。这些很多是在无意识层面发生。你甚至可以说,由于这种相互影响,研究者和参与者(至少在资料收集上)一起共同建构了该研究(Finlay, 2002)。因此,审视研究者对研究过程的影响非常重要,正如切斯尼所说的:

我赞成对自我的传记研究,不是作为独立于女性民族志或与其竞争的研究,而是作为一个培育床来存放研究发现,以及作为透视研究过程的一部分。诚实而开放地反思有助于我保持某种诚实、形成洞察力和自我意识,而且还给了我一定程度的自信。(Chesney, 2001, p. 131)

虽然现在这些考虑对研究过程是必要的,但是研究者赋予反身性及其实施程度的意义会随着研究者哲学取向以及和研究过程联系程度而变化。每一个研究者必须要对其程度、时间及方式进行思考。虽然人们都同意反身性的必要,然而对其可行性仍然有些争议。既然大量泄漏出来的信息在意识的更深层次发生,在询问我们研究中如何能够完全说明我们自己时,卡特克利夫(Cutcliffe, 2003)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然而,反身性仍然像芬莱所说的,“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可以用来:

- 审视研究者立场、视角和在场的的影响;
- 通过审视个人回应和人际间的互动来提升洞察力;
- 通过开启一个更加底层的意识来给他人注入力量;

- 评估研究过程、方法和结果;以及
- 通过提供研究决策的方法论日志,让公众能够审查研究的诚实性”(Findlay,2002,p.532)。

在做呈现在本书后面有关分析章节中的对越战老兵的小型研究时,我(科宾)发现,自我反思是一个非常自然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过程。自我反思具有很强的情感倾向(cathartic),能够帮助我看到自己是如何偏向(slanting)资料的。我注意到,正像我在评论和思考备忘录里所写的,某些内容是我对资料的情绪反应的反思,而不是对我的研究对象对我讲述内容的概念化。我重写了这些备忘录,但是我当然能够在分析中看到我自己。

敏感性

传统研究中,资料收集和分析要求“客观性”。但如今,我们都知道,在质性研究中客观性是一个神话,研究者将他们自己的范式,包括视角、训练、知识以及偏见都带到了研究情境中;因此,自我的这些方面特征被编织到研究过程的各个方面(Guba & Lincoln, 1998)。我们面临的问题包括:情况有这么糟糕吗?我们如何能够利用我们作为研究者带入研究过程中的东西,从而增加我们对被访者所告诉我们的内容的敏感性?也许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关注敏感性(Glaser and Strauss, 1967; Glaser, 1978; and Strauss, 1987)。

敏感性的本质

敏感性和客观性相对应。敏感性要求研究者将自己投入研究中去。敏感性意味着富有洞见,协同一致,能够抓住资料中相关的议题、事件以及意外情况。敏感性意味着能够呈现参与者的观点,通过沉浸在资料中承担起他人的角色。敏感性是一种特点,它更容易出现在研究者而不是其他人身上。更多情况下,它是一种品质,是在时间中,通过密切关注及研究资料 and 人们而形

成的。通过资料收集和分析过程的交替,资料的意义和主旨,通常一开始令人困惑,然后变得越来越清晰,研究者开始从参与者的视角看待议题和问题。

但是对资料的洞见不会随意发生,它们只为有准备的头脑而生,在与资料不断的互动玩味中出现。理论,我们大脑中承载的专业知识,会以多种方式注入我们的研究中,即使是相当无意识地注入(Sandelowski, 1993)。援引戴伊的话,“总之,一个开放的心灵和一个空荡的脑袋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为了分析资料,研究者调动了积累的所有知识。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不是是否要利用现有的知识,而是如何利用”(Dey, 1993, p. 63)。当研究者在分析中逐步推进时,是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专业、性别、文化等)使得他们能够对资料中的东西作出反应。当我们谈论我们给研究过程带来了什么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谈论将我们的观念强加给资料。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的背景和过去的经历提供了精神上的能力,从而能够回应和接受资料中含有的信息——同时要记住,我们的发现是资料的产物加上研究者带入到分析中的东西。

敏感性是研究者和资料间的一种神奇的相互作用,其中理解资料中被描述的东西是慢慢演进的过程,直到最后研究者可以说,“啊哈,这就是他们要告诉我的”(至少从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当研究者在解释过程中忽视自我的相关性,而且资料在通过研究者的“眼睛”说话时,研究者还认为只是资料在说话,这时候,很有可能是研究者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资料(Glaser, 1992)。我们越是能够意识到资料分析中的主观性,我们越有可能明白我们是如何影响解释的。

专业经验能够提高敏感性。尽管经验可能会妨碍分析者正确地阅读资料,但经验也能够使得研究者更快地理解某些东西的意义。这是因为研究者不必花费时间熟悉环境或事件。虽然“新鲜的面孔”常常很重要,但是有时候一个新手研究者只是熟悉环境就要花费一两周的时间,而且这期间,时间——以及资料——可能就丢失了。有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记住。第一,始终要将知识和经验进行对比,绝不要忽视资料本身。第二,总是根据概念

的属性与维度来思考,因为这样能够让研究者专注于事件的相同和不同之处,防止出现过多的描述性资料。第三,重要的不是研究者对事件的看法,参与者所说的或做的才是重要的。例如,科宾或许知道,医院中有一种设备是用来做X透视的。但是在做一项病人对医院设备的反应或体验的研究中,相关的并不是研究者对该设备的理解。相关的是参与者赋予该设备的意义以及这些意义是如何形成和转化的。参与者会将该设备描述为一种落后的机器、一种身体威胁、某种有益的或挽救生命的因此能够忍受的东西吗?对该机器的体验是痛苦的、令人恐惧的,还是使人不舒服?让研究者专注于资料的是有一个比较的基础,通过它来研究。研究者或许会对自己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诊断的设备”,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一件有用的工具”——该设备的所有属性。但是我却是从一个护士的角度来看它。病人是以同样的方式来描述他们的体验吗?或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它吗?他们赋予该设备什么样的意义?和该设备接触在他们那里产生了哪些情感反应?当他们将参与者的描述和其他参与者或研究者的描述进行对比时,一名参与者的描述往往显得较为突出。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虽然研究者可能从来不会体验到不希望的离婚,但是经历了爱人的死亡确实有助于其理解丧失和悲伤的意义。经历为其提出离婚中有关丧失和悲伤的问题提供了比较的基础。一旦研究者形成了丧失和悲伤的一系列属性,那么提出来的这些属性就能够用来作为比较的基础来审查资料。最终,只有资料本身才是重要的,但在一开始的时候,研究者的经验能够提供一些洞察力。我们不需要每天都重新发明生活,否则我们将不知所措。相反,通过将我们不知道的和已知进行比较,我们建立起我们的知识基础。研究也是同样的。

在研究者开始分析资料时,令人不解的是如何建立敏感性。有时候,研究者遇到一段资料就陷入困境,不能辨别其意义。本书的作者发现,在日常各种各样的活动中,研究者头脑中常常带着他们的分析问题。这样,或许当他们在阅读报纸、和同事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或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一种洞见就出现了,于是

研究者能够理解那些目前还意义很少或没有意义的资料。从技术上说,这些洞见属于资料,即使该洞见由其他经验所激发。

背景、知识以及经验不仅让我们对资料中的概念更加敏感,而且让我们能够看到概念之间的联系。正如生物学家谢耶曾经写道,“首先不是看见某物,而是在先前已知的和迄今未知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这些未知的东西构成了具体发现的本质”(Selye, 1956, p. 6)。换句话说,为了知道我们在资料中“看到的”是重要的,以及能够分辨出概念之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必须有一些背景,这些背景要么是通过沉浸于资料,要么是个人经验。

关于敏感性这一部分内容适合于培养跨文化研究。虽然这些作者不是该领域的“专家”,但我们确实知道,在分析其他文化或其他性别的时候,敏感性特别重要。伊娃·霍夫曼有一本标题为《在翻译中丢失的意义》(*Lost in Translation*)(Hoffman, 1989)的精彩著作。霍夫曼出生于波兰,七岁时移居加拿大。当她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她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缺乏表达自己在这个新鲜而又陌生的国家中经历的语言。当她试着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其复杂性丢失了。研究者应该记住这一点,尤其是在做跨文化研究时。某种复杂性可能会丢失。作为教师,这些作者都曾面对过这样的难题:外国学生在他们自己国家做研究常常遇到没有具体对应的英语概念。例如,我们一个学生,纪子山本(Noriko Yamamoto),她在资料中发现两个用来表达护理质量和水平的日语概念,这是在她父母老年痴呆加重时,由日本家庭看护者说出来的。一个概念是“amaeru”,用来描述较年轻的护理人员(caregiver),希望从还能够作出回应的受护理者那里寻求宠爱;还有一个是“amayakasu”,用来描述那些当作为成年人的受照顾者不再能够作出回应时,由护理人员给他们提供的宠爱(Yamamoto & Wallhagen, 1998)。

研究者有很多方法能够用来增加跨文化研究中的敏感性。例如,切斯尼利用巴基斯坦导师们帮助她理解参与者对她讲述的内容。她说,有时候她希望自己是巴基斯坦人,这样就能够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Chesney, 2001)。想要阅读关于如何处理研究

中差异性的精彩讨论,可以参阅 Green, Creswell, Shope, & Plano Clark (2007)。

文 献

研究者将大量的专业和学科文献背景带入了研究。这些背景可能是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获得的,或者只是在“跟上”该研究领域过程中学习得来的。在研究过程中,分析者通常发现传记、备忘录、手稿、报告似乎与他们的研究领域有关。它们就像从文献中获取的知识一样,问题是如何用它来提高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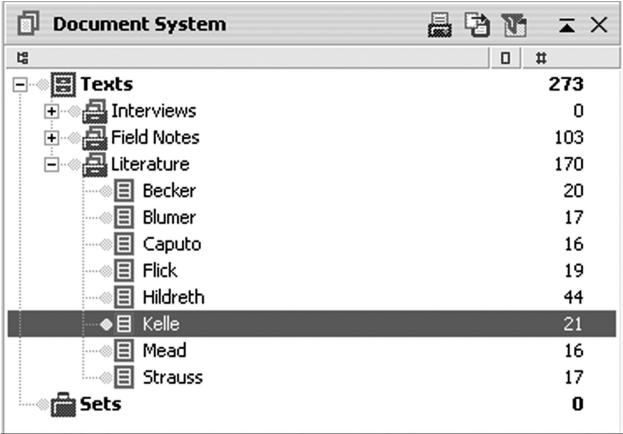
当然,学科、学派以及研究者的视角将极大地影响文献量的获取及其被使用的方式。首先,能够向读者保证的是,没有必要回顾该领域先前的所有文献。研究之前,知道要从这一堆资料中提出哪些突出的问题或相关的概念非常重要。总有某种新的东西可以发现。如果一个话题的所有问题都已经知道了,就没有必要做质性研究了。而且,研究者并不想浸泡在文献中,这样他或她就会受到文献的限制,甚至被文献所窒息。在研究之前或研究过程中,如果学生过分沉溺于已有的研究或理论,以至于他们几乎都失去了研究的勇气,这种情况很常见。贝克尔说得很好,他指出,“要利用文献,但不要让它利用你”(Becker, 1986b, p. 149)。

利用技术文献

尽管下面列举的没有穷尽所有的作用,但它却描述了可以如何使用技术文献:

- 它可以用作比较的来源
- 它可以提高敏感性
- 它可以储备一些几乎没有解释的描述性资料
- 它可以提供开始观察和访谈的问题
- 它可以在分析中用来激发提问
- 它可以为理论抽样的范围提供建议(见第7章)

- 它可以用来证明研究发现,或相反,研究发现可以用来证明文献在哪里有错误、过于简单,或只是部分地解释了一个现象



屏幕截图 1 该截图显示的是 MAXQDA 的四个主窗口之一：

文件系统窗口 (Document System Window), 你的资料全部在此存储和处理。可以通过文本群 (text groups) 来组织资料, 让你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给资料分组。文件系统处理的方式类似于 Windows 浏览器。在该例中, “访谈”和“田野笔记”分别都有它们自己的文本群。而且, 建立文本群“文献”的目的是将重要的文章、摘要等整合到项目中去。这样就可以直接找到相关的文章等, 而且你可以将要援引的文献直接拷贝和粘贴到备忘录中。

下面我们将逐条进行讨论。

来自文献的概念可以作为资料比较的来源, 只要是对属性与维度进行比较, 而不是将其作为资料本身来使用。如果资料中出现一个概念, 它让人想起来与文献中的相似或者相对, 那么研究者既可以从相似性也可以从差异性来审查。例如, 设想一个研究者正在研究如何“处理”在工作事故中丧失配偶的问题。当然, 处理此境况下的丧偶问题和其他类型的方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例如, 处理与离婚有关的丧偶问题, 但是它们也有很多差异。有时候比较两个概念相似但情境不同的概念 [这里的概念是“丧失 (loss)”] 要分别描述

他们的重要属性。如果你根据丧失的时间、以前有关丧失的体验、对配偶的感情等这样的属性与维度在进行思考,情况就尤其如此。

对文献的熟悉能够提高对资料细微的敏感性。虽然研究者并不想带着一大串概念进入田野,但是有些概念可能一遍又一遍地在文献中出现,而且也在资料中出现,这就表明它们的重要性。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时,研究者要询问的重要问题是:“这些概念真的来自资料吗?或是因为我对这些概念太熟悉而将它们强加给资料?”例如,像护理和心理学领域中的学生给所有事情都贴上了“处理”的标签,这很常见,因为这个概念和他们的专业有关。然而,“处理”也许不是描述该研究中所发生的事情的最好概念。分析者必须学会“盒子外”思考*,并摆脱滥用专业概念,例如处理。然而,如果一个概念确实相关,要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个概念和文献中的概念有什么异同。

已有的描述性材料对研究者还有一种特别的意义。书面材料常常为某些概念或研究发现提供说明,包括一个几乎没有解释的相关话题的描述性资料。阅读这样的文献几乎就像阅读其他研究者为相同或其他目的而收集的田野笔记一样。如此大量未经解释的研究发现能够激发思考,而且会让分析者对自己资料中的东西更加敏感。它还可以启发研究者对资料进行提问。而且,研究的主题或概念可能和研究者的研究相关。但是,要强调我们前面所说的,研究者必须要非常仔细地在自己的资料中寻找事例并识别概念在自己研究中的呈现形式。

在开始研究之前,研究者借助于文献提出最初观察和访谈的问题。在最初的访谈或观察之后,研究者将转向来自资料分析的概念和问题。通过提供一系列要研究的概念领域,最初来自文献的问题也可以用来满足人类研究对象委员会们(Human Subjects

* 所谓盒子外思考,也可以说是非限制性思考。它的反面是盒子内思考(Think Inside the Box)。盒子内思考是一种自然且习惯的思维,所以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都是进行盒子内思考。从这个角度上说,盒子外思考也可以翻译为非习惯性思维或非传统性思维。本文采取直译的方式。——译者注

Committees)的要求。虽然新的领域将会出现,最初的问题至少说明了研究的总体意图。

技术文献也可以在分析过程中用来激发问题。例如,当研究者的资料和文献中报告的研究结果存在分歧的时候,这样的差异应该促使提出这样的问题:“怎么啦?我忽视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了吗?这个研究中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将对我要看的东西有什么影响?”

文献可以对理论抽样范围提供建议(第7章),特别是在研究的开始阶段。文献能够提供洞察力,让研究者知道到哪儿(什么地方、时间、论文)去探究相关概念。换句话说,它可以引导研究者到那些他或她可能没有想到的情况中去。当研究者完成了他或她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工作,并进入写作阶段,文献可以用来确认研究发现,或者正好相反,研究发现可以用来证明文献是错误的、简单化的,或者只是能够部分地解释现象。将文献带入到写作中,不仅表明学术性,而且可以延伸、验证和提炼该领域里的知识。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题目已经做了充分的研究,他或她应该避免研究发现的不可靠,即使它们与已有的文献不一致。这些差异能够为新的发现指明道路。

利用非技术文献

非技术文献包括书信、传记、日记、报告、录像、回忆录、报纸、手册、备忘录(科学的)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材料。非技术性文献可以用作上面列举的所有目的。另外,非技术性文献还有下面的用处:

- 它可以用作原始资料
- 它可以用来补充访谈和观察

非技术性文献可以用作原始资料,尤其是在历史或传记研究中。因为对有些历史文件、信件、回忆录和传记的真实性的证实和确定一般比较困难,因此,交叉检验资料(cross-check data)就非常重要,通过审查各种各样的文献,如果可能,还要对访谈和观察

进行补充。从第8章开始,在这些分析的章节中,你将会看到科宾如何利用回忆录和历史文档作为原始资料的。

非技术性文献可以用来补充访谈和观察。例如,通过研究有关报告、通信和内部的备忘录,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个组织机构的大量信息,它的结构以及它如何运作(这在观察或访谈中也许不能直接看到)。

理论框架

在结束这一章之前,谈一谈理论框架的运用似乎挺合适。在量化研究中,理论框架很常见。它们为选择要研究的概念,提出研究问题以及形成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概念指导。例如,帕特里夏·范霍克,一名来自东田纳西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正在使用科宾和施特劳斯的“慢性疾病发展轨迹(Chronic Illness Trajectory)”和“恢复(Comeback)”的概念(Corbin & Strauss, 1991a & 1991b)指导自己对妇女中风(strokes)的研究(Vanhook, 2007)。概念不仅为她的研究提供了结构,甚至还有测量工具的选择。每一种工具都被选择用来测量恢复的一个要素方面(component):身体的恢复和复原、对丧偶的心理调节,以及重新调整生活步调。在质性研究中,理论框架的使用并不很清楚。对于是否应该使用框架以及如何使用似乎存在分歧。我们知道,很多质性研究者确实用理论框架。其实对这个话题,我(科宾)和同事简·吉尔甘(Jane Gilgun)有过大量的讨论。

尽管本书作者的偏好是,不喜欢以一个预先界定的理论框架或一套概念开始我们的研究,但是我们承认,在有些情况下,理论框架还是有用的。例如:

- 研究了一个问题之后,研究者发现一个原先提出的框架和研究者当前研究中所揭示的情况非常一致,因此,研究者可以用它来补充、拓展以及证明该研究发现。
- 来自文献的框架还可以用来提供另外一种解释,因为我们都知

道,事情总有不只一种解释——不过这里我们必须小心,因为来自文献的框架可以解释研究发现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这样研究者会试图扭曲研究结果来与理论保持一致。

- 如果研究者正在建立一个研究程序或想要形成中层理论 (middle-range theory), 那么一个先前找到的理论框架可以为其提供洞察力、方向以及一系列有用的初始概念。然而, 研究者应该对新观念和概念保持开放, 并且当他或她发现某种“引进的”概念不符合资料, 要能够放弃。“保持开放”是至关重要的, 即使对那些有经验的、根据自己的研究程序进行研究的 researcher 而言。
- 理论框架能帮助研究者决定要使用的方法论。

熟读期刊文章就会发现, 研究者常常运用理论框架来证明其使用特定的方法论或采取某种取向的合理性, 尤其是在护理专业中。例如, 霍尔罗伊德在中国做的有关护理的研究中使用了来自认知人类学范式的一个框架, 该框架聚焦于“共享的、被认可的和传承的内在文化呈现形式, 其观点是文化的指导方针存在于特定社会的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 (Holroyd, 2003, p. 306)。通过使用该框架, 霍尔罗伊德希望能够发现, 责任和义务应该与中国社会的性别和生育指导方针相一致。在另外一个例子中, 研究者在对“临终关怀 (palliative care)” 的本质研究中, 作为方法论的选择, 他们用符号互动主义来解释扎根理论 (Cannaerts, Dierckx de Casterlé, & Grypdonck, 2004)。

当研究者用马克思主义或女性主义或互动主义哲学取向做研究的时候, 使用理论框架就会出现一些差异。在这种情况下, 哲学倾向可能会影响研究者做研究的整体取向。里德在着手她的标题为《被排斥的伤口》(The Wounds of Exclusion) 的专著研究时, 将自己定位于一名女性主义者在实施女性主义的行动研究。在解释其意义时, 她说: “在下面的补叙中, 我试图对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的角色和自我作出说明性的解释, 以便作出批判性的分析及负责任地使用权力” (Reid, 2004, p. 6)。

我们继续另外一个相关的话题,如果质性研究者想要扩展一个实质理论(a substantive theory),或将一个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获得的理论(substantively derived theory)提升为中层理论,他或她可以从一个概念开始。例如,“意识(awareness)”这个概念,它来自格拉泽,施特劳斯和贝诺利尔对死亡的研究并出现在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的《死亡意识》(Glaser & Strauss, 1965)一书中。这个概念被用来解释各种互动者/行动者(inter/ actants)(健康专业人员、家庭,以及正在死去的人)如何管理有关病人死亡过程的信息。一名研究者,如果对发展“信息管理”的中间理论感兴趣,他或她可以从格拉泽和施特劳斯描述的“意识(awareness)”这个概念开始,并将其作为研究的一个基础,研究在婚姻背叛、间谍活动以及“亲密的”伙伴之间是如何透露信息或对其进行保密的。很可能会发现新的类属,也会有对前面发现的类属的扩展。最后,“意识”将被提升到一个更加抽象的层面,因为它现在正被跨情境使用。想要阅读讨论关于形成、检验及连接一般理论的文章,请参阅施特劳斯题为《关于一般理论的本质和发展的说明》(Notes on 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General Theories)的文章(Strauss, 1995)。

要点总结

本章包括四个主要领域:(a)选择研究题目并陈述问题,(b)形成对资料的敏感性,(c)文献的使用以及(d)理论框架的运用。在开始研究之前,必须要对每一个领域进行思考。

研究题目和问题。最初的研究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引导着研究者从特定的视角来审视资料,以及使用某些资料收集技巧和资料分析模式。研究问题为研究项目定调,而且帮助研究者集中注意,即使是大堆大堆的资料。质性研究中最初的问题常常是开放式的而且比较宽泛。随着研究的进展,研究领域中和问题的发现,研究问题往往会变得更加精炼和具体。最初的研究问题可以是由教授或同事建议提供,或者来自文献或研究者的经

验。无论问题的来源是什么,重要的是研究者对课题(subject)要有激情,因为他或她将必须和该课题生活一段时间。

敏感性。如果你在质性研究中不能做到客观性,但你也许可以保持敏感性。敏感性,或对资料的洞见性来自于研究者带入到研究中的东西,以及在资料收集和分析过程中的投入。敏感性让研究者能够抓住意义,从知识上(和情感上)对资料言说的内容作出反应,从而能够发现扎根于资料的概念。然后,在着手撰写研究报告的时候,同样的敏感性让研究者能够将参与者的集抽象概念、细节描述以及感情于一体的故事呈现出来。

使用文献。技术文献和非技术文献往往以某种不同的方式以及特定的方式发挥作用。除了使用一般的技术文献之外,聪明的研究者有时候会使用各种其他类型的公开及非公开材料来补充他们的访谈和田野观察。虽然通常进入大脑的是报告和传记,但还是有很多有用的非技术文献。

技术文献能够提供最初的问题、最初的概念以及理论抽样的观念。非技术文献既可以用作原始资料和补充资料,用来作比较,也可以作为形成一般理论的基础。研究者要记住的重要方面是,如果将技术文献放在研究者和资料之间,它会妨碍创造性。但是,如果将技术文献用作比较,它能够帮助寻找相关概念的属性与维度。

理论框架是一种技术文献。在质性研究中常常用到,然而它们的运用不同于量化研究。也就是说,它们不是界定要研究的变量,它们也不像在量化研究中那样构成研究。它们往往更多的是用来证明使用一种特定方法论的合法性,或者作为研究的指导取向。另一方面,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的理论倾向(theoretical orientation)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理论倾向不能决定要研究的概念,但它确实能够决定做研究的取向。而且,对从实质理论(substantive theory)形成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感兴趣的研究者可以将实质理论用作理论基础,跨越不同群组来探究核心概念,这样就能够增加理论深度、广度以及抽象的层次。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355040242223011331>